

# 城市历史文化风貌区文化记忆生成路径研究

——以福州市烟台山为例

陈庚 周若依

**摘要:**城市历史文化风貌区是展现城市区域特质的典型窗口。文化记忆是推动历史文化风貌区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厘清风貌区与文化记忆的关系机理,探明文化记忆的生成路径,能够更好地帮助理解城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建设的内生动力与逻辑依循。在借鉴文化记忆理论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选取福州市烟台山为案例,运用扎根编码分析方法,将历史文化风貌区视为文化记忆生成的空间媒介,探究城市文化记忆如何保留、传承与再建构。研究发现,文化记忆依从“存储与提炼—激活与重现—感知与再建构”三个阶段的生成路径,并分别呈现出空间媒介表征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推进空间重塑、集体共鸣形塑文化认同的互动关系。面对历史文化风貌区文化记忆置空、失真与扁平化等问题,应以包容开放的空间形态、创新的空间开发模式、多元的主体参与等方式促进文化记忆再建构。

**关键词:**历史文化风貌区;文化记忆;空间生产;城市文化空间;文化认同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5.04.003

## 一、引言

城市历史文化风貌区既是观察城市历史文化变迁的窗口,也是呈现城市当下生产生活样态的重要空间。作为城市形象和精神特质的缩影,历史文化风貌区传衍着城市社会生活气息,烙印着城市生命历程,汇聚为特殊而又典型的城市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是历史文化风貌区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与特定地域文化特点紧密相连的共享经验与认知基础,包含了对当地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的认可与认同。可以说,文化记忆是历史文化风貌区得以保存、延续的内在依凭,也是风貌区传承发展和创新实践的精神来源。而风貌区则犹如一个巨大的空间容器,承托着文化记忆的生成与传衍。

在我国,历史文化风貌区建设曾在城镇化热潮中出现过“去地方性”的大拆大建、仿古造假等“建设性破坏”现象,对于消费主义、商业化与精致造型的过度追求,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城市遗存的地方性文脉和历史记忆。21世纪以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年)、《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方案》(2016年)及相关规划相继颁布,匡正了社会上对城市历史文化街区以及风貌区的认知,并敦促相关主体进行更理性的保护和开发。从此,历史文化风貌区建设也开始基于经济、社会、生态、人文等多维关怀,调适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创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进而探索以文化记忆为中心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发展新路。

与实践层面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开发的记忆转向相随,文化记忆理论也开始在城市研究中日渐广泛地应用。一些学者引入文化记忆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城市空间生产中的文化记忆<sup>①</sup>,城市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艺术管理体系创新研究”(24ZD17);武汉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陈庚,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2; chengeng127@126.com);周若依,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深圳 518057; zhourouyi1022@163.com)。

<sup>①</sup> 庄立峰、叶海涛:《城市空间生产中的文化记忆》,《艺术百家》2016年第5期。

间演变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sup>①</sup>,以及在历史文化风貌区中民族社区文化记忆的代际传承<sup>②</sup>、旅游体验视角下集体文化记忆的日常生活化呈现<sup>③</sup>等问题。但是,由于文化记忆理论运用于城市及其历史街区或文化风貌区的研究才刚刚兴起,相关研究尚有待大力推进,尤其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文化记忆如何生成的问题尚未得到普遍关注。剖析历史文化风貌区文化记忆的生成路径,有助于厘清风貌区空间与文化记忆之间的时空关联性,理解风貌区保护延续的内生动力与底层逻辑,从而为改善风貌区的空间、经济、社会和人文环境提供理论支撑。因此,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有必要探究历史文化风貌区在城市文化记忆存储、传承与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空间媒介作用,并归纳文化记忆的生成路径,为历史文化风貌区建设提供方向性指引。

## 二、历史文化风貌区文化记忆生成的理论框架

### (一)文化记忆理论及其内涵

文化记忆概念源于集体记忆。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首先提出了“集体记忆”概念,并将其视为社会文化建构的过程<sup>④</sup>,从而将“记忆”逐步引入了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8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概念将记忆理论推向了更广泛的空间实践中。诺拉将博物馆、档案馆和纪念仪式等展演空间与活动空间视为可以对历史记忆进行重构、传递和存储的“记忆之场”,继而探讨了纪念性空间如何作为实在的、象征的和功能的场所而存在<sup>⑤</sup>。20世纪90年代,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正式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其中,扬·阿斯曼阐释了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差异,指出前者是由个体承载的口传记忆,通过集体成员的日常接触、交流而建立,而后者核心是群体身份认同和自我形象的确认,借由社会文本、仪式、纪念碑等物质文化符号保持延续<sup>⑥</sup>。阿莱达·阿斯曼则进一步分析了文化记忆如何抽离于个体、群体和具象的物质载体,进而转化为符号媒介中的精神性内容与社会性认同。她强调“记忆是存储器,回忆从它之中选取、现时化、取其所需”<sup>⑦</sup>。当前,文化记忆的研究日渐成熟,有关记忆与知识谱系、集体身份、社会价值体系间的内在关联的研究不断拓展,文化记忆的理论范畴也逐渐从历史、文学、文化遗产等领域拓展到包括历史文化风貌区在内的城市文化空间领域。当城市空间被形塑为纪念性场域,其物质性展陈便转化为历史叙事的符号系统,承担着集体记忆编码与文化身份重构的媒介功能。

文化记忆理论的相关研究强调了文化与记忆的互动关系。文化赋予记忆社会性意义,使其超越个体认知创建集体性,并通过符号、象征和实践建构对过去的叙事;记忆则是实现文化历时性延续的关键,在集体中创造出持久而有意义的联结,从而塑造社会共同的文化认知框架。由此,文化记忆的生成演进呈现三重特征:一是建构性与可塑性。什么样的记忆能够被展示、传播、传承,什么样的记忆会被遗忘,既会受到权力逻辑下官方叙事的引导,也会在特定时代的特定媒介手段下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二是时空关联性。文化记忆借由符号传承,其形成依赖于物理空间的共时性占有,但在历时演变

① 谢欣然:《城市空间演变与文化记忆的互构关系》,《人文杂志》2018年第6期。

② 郭云娇、王嫣然、罗秋菊:《旅游开发影响下民族社区文化记忆的代际传承——以西安回民街历史文化街区为例》,《地理研究》2021年第3期。

③ 曾诗晴、谢彦君、史艳荣:《时光轴里的旅游体验——历史文化街区日常生活的集体记忆表征及景观化凝视》,《旅游学刊》2021年第2期。

④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⑤ 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⑥ 扬·阿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见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⑦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6页。

的方向上,记忆服务于文化的延续<sup>①</sup>,具有文化建构与传承的未来指向。三是群体关联性。公众并非被动的记忆接受者,而是通过日常实践主动介入记忆再生产。文化记忆传播与文化情感延续,需要在大众的参与和感知中完成。

## (二)历史文化风貌区与文化记忆的关系机理

空间是记忆的重要载体,具有唤醒记忆的某种力量<sup>②</sup>。尽管历史不断变迁、革新、流动,“记忆之场”却能够通过赋予无形的东西以有形的形式来“阻止遗忘……让死亡永生”<sup>③</sup>,将特定的历史特征“锁定”在具象空间中,而后沉淀为一种可感知、可获取的文化共识。从这一层面而言,文化记忆的动态演进内嵌于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空间发展进程中,借助其空间结构和社会互动,实现仪式化建构、空间化串联与集体性延续。历史文化风貌区作为文化记忆的空间媒介,在横向的空间广度上构建记忆场域,承托着记忆的存储与再现。而文化记忆则作为风貌区发展的时序动因,在纵向时间序列中沉淀、汇集、传承、传播,串联起过去、当下和未来,推动着风貌区的空间形塑与再造。

### 1. 历史文化风貌区:文化记忆的空间媒介

在文化研究中,媒介的本质是存储和传播文化意义的工具,参与着文化创造、传播和变革的过程,成为人们感知和理解世界的通路。随着空间理论发展与媒介技术革新,媒介作为载体的外延意义不断扩大,空间媒介观从人文地理领域延伸至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起,亨利·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生产理论”、大卫·哈维的“空间文化理论”等空间学说涌现。爱德华·雷尔夫等学者也探讨了地方意象和大众传媒表征的关系<sup>④</sup>。这些理论的发展,让空间不再单纯指向“事物的生产空间”,而更多地被解析为一种“社会建构”,成为一种媒介载体。空间在物质、精神、社会、文化等多维度意义上的开掘,将社会关系、精神价值、文化意义叠加于空间的物质基础之上,凸显了空间在符号表征、信息传播与意义建构方面的媒介价值,生成了空间媒介观。基于“空间媒介”这一崭新视角,城市历史文化风貌区等实体空间可被视为通过技术自我言说和表意的媒介本身<sup>⑤</sup>,从而成为一种空间媒介,持续推动其社会文化象征意义的生成与演进。

历史文化风貌区是城市中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建筑样式、空间格局和街区景观较完整地展现某一历史时期地域文化特点的地区<sup>⑥</sup>。风貌区由多种具备历史文化价值的景观、符号、仪式等元素共同组成,涵盖河流山脉、地形地貌、历史街道、文物古迹、传统民居与风俗习惯等多元内容,形成一种覆盖物理、社会、文化、情感等多重维度的空间结构。多维空间结构重构了传统地理学框架下的历史文化风貌区,突破了风貌区在规模、格局、尺寸等物质方面的局限,通过释放文化符号的表征潜能,激活地理景观的象征意涵,从而赋予其普通功能型空间所不具备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社会文化价值。因此,历史文化风貌区可以借助符号表征与传播,重新建构、传递和存储多维度的历史记忆,成为皮埃尔·诺拉所谓的“记忆之场”。它打通了实体空间与文化想象的通道,建立起作为空间媒介的合理性,成为延续地方文化记忆、联结城市历史与现代生活的重要媒介。一方面,过去的文化记忆依托空间进行存储。恰如文化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的意义世界<sup>⑦</sup>,历史文化风貌区内各类符号的存在为“记忆之场”提供核心元素,成为共同体记忆遗产的象征,经由一系列实践主动地塑造、解释和再现过去的事件,从而影响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形成。另一方面,空间为记忆建构实践提供发生场域。市民的日常生活实践

① 王秀伟、白栋影:《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逻辑遵循与路径探索——文化记忆与空间生产的双重理论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

② 孙逊、杨剑龙:《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40页。

③ 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传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

④ 张雪、杨向荣:《符号化:空间媒介视阈下的城市形象建构》,《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⑤ 李耘耕:《从列斐伏尔到位置媒介的兴起:一种空间媒介观的理论谱系》,《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11期。

⑥ 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市志·图书·文博分志·文博卷:1978—20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32页。

⑦ 王蜜:《文化记忆:兴起逻辑、基本维度和媒介制约》,《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

构成一座城市文化记忆的本源,文化记忆也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以不同形式进行书写。历史文化风貌区不仅是过去生活经验的历史遗存,也是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还是未来记忆生成的素材和装置,这一高度开放的空间通过强化个体的“身体在场”性,将身体知觉、实践活动与空间体验的具体内容紧密结合,从而完成记忆的建构和再现。

## 2. 文化记忆: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时序动因

文化记忆是一种时间叙事。文化记忆通过指涉历史形成一个历时性的时间轴<sup>①</sup>,经由代际传承得以延续并发展。“历史只有一个,着眼于整体,向我们呈现一幅过去的完整景象”<sup>②</sup>,从历史中生成的记忆通过个体和群体传衍。同时,文化记忆是动态的、不断建构着的“故事”,它会通过时间的推移和事件的演变来呈现和解释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恰如扬·阿斯曼指出的“时间中充满了非连续性、断裂、骤变,它表现为时时变化着的一条线,一个由无数事件交织而成的线条”<sup>③</sup>。文化记忆不仅是知识的储存,更是对历史的叙事与想象,其特殊任务是构建个体的同一认同。在此过程中,新的社会观念以及文化实践会改变文化记忆的意义阐释,文化记忆也通过各种形式的实践来塑造,不仅包括历史书写、文学作品、纪念碑、艺术品等,也包括真实的历史事件、虚构的传说与神话等。一系列故事按照时间顺序组织编排,影响着人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

文化记忆在时间序列上构成推动历史文化风貌区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因。在时间维度上,文化记忆通过“历史—当下”的连续性转换,将抽象的时间经验具象为可感知的共享符号,组成庞大的文化生态,使物理环境升维为文化意义的生产场域。文化记忆中所呈现出的看似贴近日常的画面抑或精神性意象,往往隐含着国家、城市的兴衰变迁和时代发展轨迹中的重要事件,并刻画在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物理环境与空间结构之中。所以,文化记忆的历时性变迁与共时性的空间结构紧密联系,文化记忆重塑空间的整体格局、功能划分和象征意象,也通过群体和个人在特定时间和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持续性再生产。尽管历史文化风貌区中的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但蕴含其中的文化记忆则能够在时代变迁与人群的代际传承中不断重构,成为推动城市社会文化延续的一种动力和方式。文化记忆在历史文化风貌区内经历“层叠—选择—整合”<sup>④</sup>的传承创新过程,借由文化遗址、建筑文物、庆典仪式等具象符号,构成风貌区文化资本的具身形态与客观象征。在此进程中,记忆服务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实现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保留与文化创新。

## 三、研究案例与方法

### (一) 案例选择:福州市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

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总占地面积约348亩,曾是晚清时期“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和西方列强的领事管辖区域。该地区至今仍留存有38条历史街巷,191栋文保建筑、历史建筑及传统风貌建筑,10处古井、石碑、古巷道等,持续见证了福州近代对外开放、贸易发展、西学东渐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历程,代表着福州鲜明的中外融合的商业文化特色。2008年,烟台山景区被列为福州市特色风貌保护区,区域历史文化资源被重新挖掘并予以重视。2013—2022年,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经由政企合作完成改造更新,在保持原有的居住及文化教育功能的基础上,逐步建成了集文化休闲和旅游创意于一体的福州近现代历史文化风貌区。据媒体统计,烟台山景区修缮更新后客流量

① 扬·阿斯曼、陈国战:《什么是“文化记忆”?》,《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

② 闵心慧:《断裂与延续——读“文化记忆”理论》,《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6期。

③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3页。

④ 朱炳祥:《社会人类学》第2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5页。

大增,2023年上半年接待游客近66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近1.7亿元,成为福建省景区“黑马”<sup>①</sup>。2024年,烟台山景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成为福州市热门的城市微度假区。目前,烟台山既是福州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载体,也是兼具旅游消费功能的社会空间和本地居民生活与社会交往的日常空间。它的实践进程反映着我国城市历史文化街区转型的步伐,也标志着历史文化记忆在现代生活实践与城市空间建设中的激活与焕新,在新时代文化发展进程中具有典型性。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借鉴了扎根理论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利用质性数据分析软件Nvivo 12及Excel表格工具对材料进行分析、编码和重组。

数据分析主体包含了建设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和居民消费者的参与行动与认知。资料来源主要为游客、本地居民对于烟台山景区的游玩体验,同时采纳部分新闻评论及文献资料作为补充阐述。首先,从大众点评、携程旅行和小红书上收集2021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的评论、游记,以反映公众对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的认知、参与和评价,剔除较明显的官方宣传性语句后得到典型评论175份。其次,从新闻报道、微信公众号、地方志等资料中摘取主要反映烟台山历史遗存物及其更新建设实际情况的话语,以便对事实细节进行更详细的补充描述,去重后得到有效材料24份。累积文本资料共计28189字(见表1)。

表1 数据资料来源

类别属性	数据来源	数量(份)	编号
用户评论	大众点评	118	根据时间顺序 编码为Y1—Y175
	携程旅行	29	
	小红书	28	
新闻	《福建日报》	12	Z1—Z12
	微信公众号:漫步烟台山	3	Z13—Z15
	微信公众号:烟台山Only	3	Z16—Z18
地方志	《福州烟台山:文化翡翠》	5	Z19—Z23
	《烟台山史话》	1	Z24

(三)编码过程与解释框架

基于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程序,第一步进行开放编码,即从完全开放的原始资料中通过逐句编码的方式提取出94个参考点,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进行概念化,得到71个概念,并将初始概念分类、标签化,提炼出建筑场所、象征事物、景观风格等20个初始范畴。第二步进行主轴编码,比照范畴化提炼后的编码,根据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合并归纳,得到景观符号、文化形象等7个主范畴(见表2)。第三步进行选择编码,在开放编码和主轴编码的基础上提炼出核心范畴,并据此开发“故事线”。通过研究各个主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关系,完成理论框架的建立,从而用于现象分析。对主范畴概念的连续比较分析后,可将文化记忆的生成路径划分为记忆存储与提炼(含景观符号、文化形象)、记忆激活与重现(含意象重组、场景活化、情景融入)、记忆感知与再建构(含记忆感知、文化认同)三个阶段,以此建立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文化记忆生成的理论框架(见图1)。

<sup>①</sup> 肖颖:《从平凡到顶流,烟台山的“破圈”之道》,《福建日报》2023年12月23日,第8版。

表2 编码结果

主范畴	初始范畴	概念	主范畴内涵
景观符号	建筑场所	历史古迹留存、宗教场所多元、学校资源丰富、百年老店传承	能够承载文化记忆的外显、可观的景观载体
	象征事物	老照片、地方特产、雕像、书籍文献、民俗	
文化形象	景观风格	建筑有特色、岁月感、民国风情、中西融合	内在的历史文化背景
	名称头衔	命名意涵、多元别称、资格认定	
意象重组	因地造景	顺应地势而建、自然景观结合、观光设施建设、模糊空间边界	利用文化记忆关键意象，在历史场景塑造新功能
	场所更新	面貌焕新、空间功能再利用、品位提升	
	元素再现	符号设计、视听体验、IP形象、老字号重新演绎	
	商业有序	招商策略、业态调性一致、文化商业平衡	
场景活化	节日庆典	节庆氛围渲染、国际文化艺术节、银杏节	通过节日、仪式、活动放大并激活独特文化记忆的过程
	文艺活动	文旅演绎、艺术展览、创意活动	
	氛围营造	古今碰撞融合、文艺气息浓郁、具有时尚品位、体现民风民俗、营造浪漫氛围	
情景融入	空间进入	零距离感、历史溯源、仿佛秘境、沉浸体验	吸引核心受众融入特定情景
	受众锚定	时髦新潮、吸引年轻人、文青聚集	
记忆感知	历史情景复现	老建筑原汁原味、领略文化风貌、异域风情、看见昔日繁华	对于历史文化风貌区文化场景的感知与体验
	个体记忆寻回	儿时的记忆、童年情怀、老店承载学子记忆、几代人的记忆	
	文化基因感知	了解名人故事、学习历史	
文化认同	舒适获得	感到治愈、幸福感、放松惬意、松弛感	共同记忆催生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
	个体追随	网红经济、拍照胜地	
	身份共鸣	本地人身份、心系家乡成就、主动向外传播	
	城市归属	加深城市探索欲、城市影响力、城市地标、生活方式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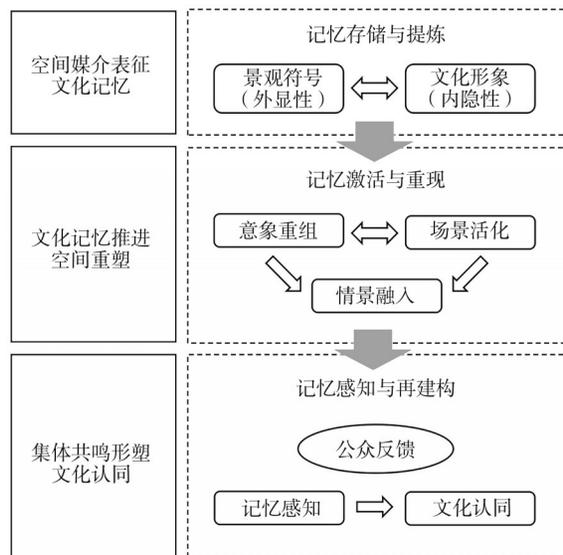


图1 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文化记忆生成的理论框架

#### 四、历史文化风貌区文化记忆的生成路径

根据扎根编码研究结果可知,在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中,文化记忆经由“存储与提炼—激活与重现—感知与再建构”三个阶段实现空间化演绎。历时性的记忆脉络与空间化的再生产持续地在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实践中互构。

##### (一)存储与提炼:空间媒介表征文化记忆

在记忆的存储与提炼阶段,文化记忆依托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空间场景完成建构。随着历史演化、时间推移而逐渐形成的城市旧有面貌被外显地烙印在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建筑古迹、名称头衔以及图片等象征性事物所形成的景观符号上,能够被人们直观地识别。同时,内隐于其中的、能够被读取和提炼的是历史底蕴,以及风格独特且内容丰富多元的烟台山文化形象。

##### 1. 历史叙事下的景观符号提炼

烟台山,亦称仓前山,海拔41.6米,坐落于福州古城传统中轴线的末端。烟台山街区是福州近代商贸、教育、文化的典型代表。早在明清时期,烟台山就已经开始发展商业贸易<sup>①</sup>。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由外国领事馆、教堂、洋行等各式风格建筑构成的空间格局日趋成型,奠定了后来“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历史风貌。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烟台山也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逐渐成为福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民国时期,金融业、民族工商业、医疗卫生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烟台山形成了工业加工区、商业金融区、文化教育区三种空间类型并存的格局。此后,近代时期的历史文化景观被较为完整地保留并沿用至今,遗留下中西结合的商贸、文教、工业场景。烟台山犹如巨大的记忆存储容器,为文化的存活提供了物质场域,并将痕迹留存于建筑、土地等空间化的载体之上,从而将流动无形的历史转化成了固定可见的空间符码。

建筑场所是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中的典型景观符号,其场所功能较为直观地反映出福州烟台山近代以来的发展情况。一是宗教祭祀场所,如陈靖姑祠、蔡中惠公祠、天安堂、石厝教堂等。共同的祭祀习俗和宗教信仰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威慑力,使得集宗教性和社会性于一体的人群聚拢模式成为最早的空间构筑动机<sup>②</sup>,成为推动烟台山空间布局的核心力量。二是学校旧址,如三一学校、陶淑女校、英华书院等,象征着烟台山区域的文化教育基因。三是百年老店、商会、洋行、工厂等工商场所,如安澜会馆、阜昌制茶厂、兰记脱胎漆器、兴隆饼店等,标志着该地区商品贸易的全面繁荣。四是政治性场所,如外国领事馆旧址、“独立厅”等,具有特定时代的变革色彩。五是名人故居、住宅,如林森公馆、罗宅、可园等。名人轶事的传播为烟台山赋予了更多文化特质。此外,旧照片、地方特产、古籍、雕塑等其他象征性事物以碎片化的形式记载着烟台山近代以来社会文化的变迁。高度凝聚化的符号系统对各种事物进行视觉和话语符号的转喻,将抽象的回忆形态转换为现时的记忆,并于上述景观符号一起建构起了象征想象的文化空间和符号化的体验空间<sup>③</sup>。

##### 2. 空间表意中的文化形象生产

在历史变迁中,文化记忆借助空间中的景观符号表意完成在地文化形象生产,将历史事实转化为文化记忆。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景观符号以视觉观赏的“看”的形式映射出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从而在同一空间场域内实现言语叙事、景观叙事乃至行为叙事的统一。溯源特定时空的历史,可以呈现并放大特定的文化形象,并将过去的文化记忆转化为当下地方感的唤醒基础。在此过程中,文化形象的呈现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遗存景观中关键特征的保留。历史文化风貌区内各类建筑场所与一

① 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烟台山史话》,福州:海峡书局,2014年,第21—24页。

② 谢欣然:《城市空间演变与文化记忆的互构关系》,《人文杂志》2018年第6期。

③ 刘慧梅、何竞:《文化记忆与凝聚性结构的本土叙事建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系列象征事物通过形态、颜色、装饰等风格化演绎,强化了烟台山20世纪中叶以前西洋文化与商贸文化广为流行的近代史全景。“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让烟台山这座百年文化港口显得更有积淀感”(Y51),指出了烟台山突出的中西交融的文化特色。二是称号所赋予的官方性认定。在地方文献中,烟台山别称多样——“女性文化摇篮”“万国建筑博物馆”“百年文化港口”等概念的生成能够放大地方特色,助推文化形象的广泛传播。景观符号的生成随着社会发展的功能性需求自然落成,而制度化的规范将烟台山文化记忆的挖掘变成了一种官方主导的自觉行为,塑造出更易感、更具代表性的近代文化风貌。

## (二)激活与重现:文化记忆推进空间重塑

在记忆的激活与重现阶段,文化记忆发挥出较为显著的象征意义,激活并推动空间的形态重塑。在烟台山修缮更新的过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记忆被着重强调,以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商业高速发展、社会文化百花齐放为代表的文化风貌被重新挖掘并放大。通过地景、空间场所更新与符号元素再现重组文化意象,利用仪式、庆典与氛围营造来诠释文化场景,并在贴合现代大众消费倾向的文化艺术活动中实现情景融入。

### 1. 关键符号的意象重组

在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空间改造更新过程中,特色风貌元素被拆分成不同的视觉片段,并被重新编码、组合成符合当代发展需求的新景观。结合资料分析,可从中提炼出几个核心意象:(1)依山傍水,体现在其地理位置上。烟台山的建筑顺应山形地貌错落分布,存在错落有致的空间关系。(2)洋气,即中西文化交融,主要体现在建筑风格的融合性、宗教的多元性和中外贸易的丰富性上。(3)工商业发达,体现在众多的历史商铺、洋行、工厂旧址上。(4)文艺新潮,既体现在该区域孕育出的发达的文化教育事业上,也体现在该区域发达的实体经济和丰富的中外品牌所带来的潮流面貌上。

以上意象是对过去烟台山历史印象、文化记忆的提炼归纳,它们被重点关注并运用在空间改造更新的特定元素之中,完成空间序列的创造性编排与系统性重组,进而推动旧有文化记忆向新兴文化场景的转化。首先,基于依山傍水的地理优势因地制宜造景。烟台山上的建筑顺应山势分布,空间结构错落有致,区域设计便顺应原有自然景观特征,通过“瓦盖山、树遮瓦、瓦成团”<sup>①</sup>的屋顶组团方式,将分散的空间串联成绵延的整体,从而“利用烟台山的地势,将这里打造成独特的商业街”(Y63)。其次,借助多元建筑风格实现场所更新。历史建筑是烟台山中西文化结合的集大成者。“老建筑主理人将自己的审美融入对建筑的修缮和使用中”(Z5),在原有的空间基础上增添新功能,如荷兰领事馆旧址(现仓山影剧院)成为烟台山文化艺术中心,汇丰银行旧址和“独立厅”现作为仓山区文化馆使用,美国、俄国领事馆旧址和乐群楼等现在也承担了博物馆展厅功能。空间维度的更新赋予历史街区更为丰富的功能价值,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多休闲互动场所。再次,运用在地材料与视觉设计完成元素再现。如:通过与周边环境相契合的装饰设计、材料质感等元素复现旧时记忆,“富有设计感的店铺和各种绿植、路灯等,都带有老烟台山的LOGO符号”(Y80);利用老字号关键元素创造新兴IP形象,以视觉符号形式串联起历史记忆与当下,“老福州生活里的茉莉花茶、鱼丸等商品被重新演绎”(Z8)。最后,优化招商策略实现文化商业平衡有序。烟台山繁荣的商贸史为如今文旅商业发展提供了适切的文化基因,推动历史文化风貌区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作为曾经的商贸中心,烟台山孕育了多个福州本地商业品牌,如第一家蒸汽动力机械制茶厂、第一家西餐厅“快活林”、沈绍安“兰记”脱胎漆器、月宫照相馆等。因此,历史文化风貌区重拾商贸中心标签,依托老字号原址进行再开发,以新锐、有特色的原创品牌为核心营业主体,引入华记杂货铺、烟台旧剧场、山水境国风体验馆等现代福州本地品牌,通过保持装潢风格、商业业态、原创产品等内容的连贯性,呼应烟台山的商业历史,从而形成当代商业发展与历史商业景象的互构效果。

<sup>①</sup> 《百年历史的烟台山,如何成为闽江边最火的打卡地?》, <https://www.lifeweek.com.cn/h5/article/detail.do?artId=213774>, 访问日期:2025年4月13日。

## 2. 记忆场景的选择与激活

文化记忆的场景激活借由仪式庆典、文艺活动及文化氛围的艺术表达共同完成。保罗·康纳顿认为,“仪式是一种形式化的语言”,纪念仪式的形式主义、表演性及其纪念内容的特殊指向性,能够塑造社群记忆<sup>①</sup>。从空间生产关系来看,仪式活动的举行及其氛围营造也在以多元的艺术呈现方式,推动记忆的符号意义从物质性的物理空间延伸至象征性的社会文化空间。烟台山创立国际文化艺术节、银杏节等一年一会的文化节日,以及举办“海丝奇妙夜”沉浸式旅游演绎、福州烟台山影像展览等文化创意活动,从而通过艺术作品、IP设计、展陈、演艺、游览互动等方式营造出可感可知的文化氛围。夜间灯光与音乐等视听设计“让整个古厝街区都将被灯光、音乐重塑”(Y33),依托沉浸式氛围感的营造,再现“文艺小资”的主旨风格。“烟台山银杏节又来了!现在已经是烟台山具有代表性的特色之一……让人联想到过去在这里发生的历史故事。”(Y156)记忆信息通过文化活动这类非物质形态充当传播介质,借助多元的艺术表达方式放大和激活,使其成为文化特殊性的外显表征。

与此同时,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sup>②</sup>,权力在文化记忆生成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既塑造着人们对于历史和文化的理解,也规制了当下社会文化的生产与社会群体的汇聚。文化记忆的场景选择需在政府支持下实现。从社会价值上看,地方政府对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视、街区对特色文旅消费诉求的回应、地产开发商对地块经济效益与品牌特色的追求等多重努力,使烟台山“万国建筑博览馆”的独特性被激活。官方话语的对外传播、上位规划的统一指导及政企合作的协同发力,共同决定了烟台山作为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现代性定位,即集特色商住、民俗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艺术+商业+体验”式的休闲消费场景。在开发进程中,符合该定位的历史符号被保留重塑,与之不匹配的符号被修正,最终呈现出“人文情调”(Y131)、“充满了文化气息,浪漫气息”(Y138)、“浪漫而神秘的氛围”(Y132)等语段所体现的主题统一、和谐共生的文化场景。

## 3. 情境营造与受众融入

在社会审美活动逐渐深入大众生活空间的当下,艺术文化活动与商业活动的界限越发模糊,城市公共街区也能成为艺术发生的场所。“在烟台山的艺术展基本分布在开放的古厝、街巷街面、商铺中,游客只要抬头转身,就能和艺术撞个满怀。”(Z9)烟台山艺术展览分布在大多数开放的街道中,与参观者产生近距离接触。受众能够借助周边的景观设施快速进入文化场景,完成艺术观赏与文化消费的身体在场。各类休闲艺术空间的开发亦迎合了消费者的审美及休闲娱乐需求,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交往的场所。此外,街区景观设计、文化活动策划锚定特定的受众,实现了符号消费带来的经济效益。“街区设计符合潮人审美,美食美景潮流聚集地”(Y137)、“文青打卡聚集地”(Y167)等语段表明,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将目标受众锚定在当前具有较强文化消费能力、追求文艺时尚等审美价值的青年群体。由于青年群体的消费文化有其特殊性,他们更追求商品所象征的某种社会文化意义,更愿意借助消费表达自己的身份地位、情趣品位、个性禀赋等特征<sup>③</sup>,因而在身份建构、审美满足、社交需求以及营销刺激的共同作用下,青年消费者也更乐于追求旅游景观中的独特文化所带来的深度体验。对于历史文化风貌区而言,塑造贴合青年文化消费偏好的景观,有助于其商业营销目的的达成、文化形象的宣扬和文化记忆的延续,进而实现风貌区中文化符号的消费转化。

### (三)感知与再建构:集体共鸣形塑文化认同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也是推动文化记忆不断再建构的主体。在记忆感知与再建构阶段,时间上线性流动的文化记忆和空间上横向延展的文化场景交融成触达受众的锚点,参与其中的公众主体通过生活、文化、娱乐等不同层面的体验唤醒旧时记忆,浮现出历史情境、个体回忆和文化基因等

①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② 陶东风:《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9期。

③ 朱强、张寒:《符号消费:代购热潮下青年消费行为透视》,《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1期。

内容,也唤醒当地居民的身份归属、形塑来访游客的文化认同,从而在个体的感知与群体的共识中实现文化记忆的传承、传播与延续,进而完成文化记忆的再建构。

### 1. 记忆感知中的情感分异

烟台山的文化记忆感知主要包括历史情境复现、个体记忆寻回、文化基因感知三个维度。首先,历史情境来自观光者对文化空间所呈现风貌的背景解读。如:“领略了这里在当时战争年代的租界历史和文化。”(Y36)“从中西结合的风格中体会到当年的异域风情。”(Y166)“在商业活动中看到昔日繁华场景。”(Y86)景观符号为观众与烟台山文化记忆之间架起桥梁,将观众沉浸式地带入历史场景。其次,个体记忆在文化记忆的整体框架中实现差异化的情感流动。如:“烟台山是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我对这里有一种特别的情怀。这里也是我爸爸成长的地方,每每来逛烟台山,他都会饶有兴致地跟我介绍。”(Y26)个体的情感体验和情感关联影响着他们对记忆符号的接收和反馈,将记忆感知与其亲身经历、时代特质和生活事件相关联,表露出更多对于旧时生活、邻里关系、传统味道的怀念。最后,文化基因感知作为更深层次的文化记忆读取,通过风貌区所呈现的历史文化特征,溯源场景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如:“了解到和叶圣陶、林则徐、林徽因等有关的故事,没想到这么多名人来过这里。”(Y129)“适合喜欢历史的同学来学习。”(Y140)这种记忆感知不仅关注场景的外在表象,更能对传统价值观和社会经验生发联想,使文化记忆得以在知识谱系中得到延续和传承,为个体和社会赋予更加深刻的文化认同和共鸣。

### 2. 从情感凝聚到地方认同的文化记忆再建构

文化记忆触达公众后,能够引导人们完成相应的文化生产实践,这一过程表现在大众的文化舒适获得、个体追随、身份认同与城市归属上。首先,历史文化风貌区构建的城市休闲、旅游、社交空间激发公众游玩的愉悦感与幸福感,创造出个体层面的舒适获得。其次,风貌区新空间带来的社群关系伴有随从性特征,公众在游玩途中会追随“打卡取景地”、仪式感的留影方式、特色文化活动等消费行为,符合当下追求社交属性和象征意义的消费文化。如:“行人在这里自动慢下来,在镜头里摆出相似的Pose……很多情侣穿着民国风格的衣服到这拍艺术照。”(Y116)在互动仪式链理论中,共同关注的焦点会刺激参与者产生共享的情感状态,在相仿的游览、社交行为中创造出共享符号,继而推动个体情感向群体团结靠拢<sup>①</sup>。再次,当空间以其独特的文化隐喻吸引不同群体因为共享的经历凝聚到一起,群体的共同身份认知也得以建构<sup>②</sup>。“我走在巷子里,店主见到我会打招呼、吃饭会送我一瓶酒。我去模范书局,主理人会和我聊起他们的装修故事。有一个骑着单车卖手冲咖啡的小哥生病了,大家会组织给他捐款。”(Y124)可见,商家、运营者乃至游客、消费者在共同的空间中经历相似的文化实践,多主体间的接触与交流,能够促成临时抑或长久的社群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变得更加紧密。最后,在群体身份共鸣渐趋强化的过程中,地方特色的价值观与文化底色赋予公众更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对内提升地方居民自身的城市自信,对外加深游客的城市探索欲与城市生活方式感知,通过一系列口碑传颂、媒体传播事件提高城市的影响力。如:“福州之行的第一站,加重了我探索这座宝藏城市的好奇心。”(Y51)“因为这里喜欢上了这座城市。”(Y83)

## 五、总结与讨论

通过以上以文化记忆理论为逻辑原点的研究,可以得出历史文化风貌区中城市文化记忆的生成路径,并将其归纳为“存储与提炼—激活与重现—感知与再建构”三阶段特征。在第一阶段,历史叙事经由城市变迁积累形成,文化记忆依靠空间的物质形态存储,又借助景观符号得以提炼,成为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形象表征。在第二阶段,记忆成为推进空间再造的核心动力,通过关键意象的重组与记忆

①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5—128页。

② 刘慧梅、何竞:《文化记忆与凝聚性结构的本土叙事建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场景组合来实现对城市文化形象的现代性演绎和呈现。在第三阶段,文化记忆在公众与符号的互动中展现出功能意义,使历史文化风貌区成为社会集体情感共振与文化认同的发生场域,实现文化记忆的感知与再建构。文化记忆生成的三阶段具有递进性,这一变化规律与社会经济体制、文化政策紧密相关,也体现出不同时期历史文化风貌区对于城市的功能定位的差异。

当然,历史文化风貌区文化记忆的生成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在记忆存储与提炼阶段,历史文化易陷入空间区隔化误区,即在保护开发过程中,粗暴地将单体文化遗产从其所在环境中剥离,忽略整体环境结构及符号的历史文化关联,从而瓦解了记忆的整体性和深刻性。在激活与重现阶段,过度商业化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如“网红打卡地”加速了城市景观与文化体验的同质化,造成文化记忆失真。在个体记忆感知与再建构阶段,存在权威主导下的文化记忆同质化生产与个体多元异质性之间的矛盾。文化记忆的选择权常因技术能力、资源条件、信息差异等现实制约而无可避免地移交官方权威话语掌控,导致作为文化记忆主体的公众成为被动的文化接受者。

立足文化记忆生成机制与文化空间生产的协同逻辑,再结合福州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实践样本,未来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发展进路应不断优化,以推动文化记忆的传衍和鼎新。

首先,要以包容开放的空间形态实现文化记忆共存。历史文化风貌区建设应从“点上突破”走向“整体串联”,形成风貌区的人文、建筑、社会等系统脉络。物理空间设计应保留公共空间的开放性,通过增加设置广场、绿地、休憩平台等开放性区域,为公众提供充足的社会交往场所。制度空间规划要注重文化记忆保护与权力话语的平衡,持续完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立专职文化管理机构等。精神空间创造上要鼓励文化共享,以近距离、大众化的方式输出文化内容,探索街区空间策展、文化IP联名等轻量化传播方式,进而实现公众消费参与中的文化共享。

其次,要创新空间开发模式,减少文化记忆失真。在空间塑造过程中,应追求“发展着的原真性”。与地方民俗文化、水土风貌及生活背景息息相关的文化记忆实践,可以为文化记忆的动态延续、解构与再建构提供充分的生发土壤。既需保留记忆的真实性,充分尊重地方原有的历史故事及习俗、节日特色,也要善用现代设计理念,充分提炼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并结合现代技术和审美,将本地传统文化更新为可见可知可感的元素符号,在新的文化实践中不断推动记忆的动态发展,从而延展文化记忆边界。

最后,要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文化记忆再建构。城市空间区域的未来发展需要从物的逻辑、资本的逻辑、权力的逻辑、流量的逻辑中,重新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底层逻辑<sup>①</sup>。以历史文化风貌区为代表的城市文化空间、记忆空间建设,需引导更多元的记忆主体参与空间实践,让公众成为文化记忆的延续主体和文化空间的共享者与维护者。另外,还要通过设立透明化决策平台保障公众话语权,探索形成社区议事会、记忆工作坊等机制来激活主体性,逐步建立“政府引导—公众参与—资本协同”的城市发展模式。

---

## Pathways to Cultural Memory Generation in Urban Historic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A Case Study of Yantai Mountain, Fuzhou

Chen Geng<sup>1</sup> Zhou Ruoyi<sup>2</sup>

(1. Nation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P.R.China;

2.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ZTE Corporation, Shenzhen 518057, P.R.China)

**Abstract:** Cultural memory serves as the intrinsic found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continuity of

---

<sup>①</sup> 胡建兰、张娜:《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新理论新战略的生成逻辑》,《文化软实力研究》2019年第5期。

urban historic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functioning as the spiritual source for their heritage transmission, developmental evolution, and innovative revitalization. These distinctive urban spaces function as multidimensional containers that not only physically preserve cultural artifacts but also socially sustain the dynamic processes of memory generation, transmission, and perpetual renewal. The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memory systems, coupled with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memory formation pathways, provide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the endogenous dynamics and operational logic underlying urban cultural preservation initiatives. This understanding becomes particularly crucial in contemporary urban development contexts where globalization pressures increasingly threaten local cultural identities.

This research employs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to examine Yantai Mountain Historic and Cultural Landscape in Fuzhou, a representative case of China's modern urban heritage conservation efforts. Through grounded coding analysis, the study identifies a tripartite model for cultural memory generation: storage and symbolic refinement, activation and representational reproduction, and public perception and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first stage, historical narratives undergo continuous sedimentation through urban morphological changes, with cultural memory being materially encoded in spatial configurations and semiotically refined through landmark symbols, collectively forming the district's identifiable representational matrix. The second stage reveals memory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behind spatial reconstruction, enabling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urban cultural images through the reorganization of key imag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memory scenes.

The third stage demonstrates the performative nature of cultural memory as it achieves functional realization through interactive engagements between social actors and environmental symbols. This transformative process converts historic landscapes into dynamic theaters for collective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identity negotiation, ultimately accomplishing the cyclical regener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These three stages are progressiv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 and cultural policies, and reflect shifts in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districts across different urban eras. Throughout these stages, cultural memory and spatial media continuously interact, fostering collective cultural identity.

Despite these theoretical insights,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encounter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cluding memory erosion, representational distortion, and experiential homogenization.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such as adopting open morphological configurations, implementing innovative conservation technologies, and establishing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at enable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in memory reconstruction processes. Theoretically, this research expands conventional heritage studies by introducing a processual model of cultural memory formation. Practically, it provides policymakers with actionable guidelines for sustainable 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management. Ultimately,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offer not merely an analytical lens for examining urban sociocultural textures, but more importantly, a visionary paradigm for guiding the ethical development of future urban cultural ecosystems in an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world.

**Keywords:** Historic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Cultural memory; Spatial production; Urban cultural space; Cultural identity